



论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激活

陈杨滢 林国标 林其昭

摘要: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为什么需要被激活?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可以激活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激活中华文明的?中华文明是发展得最好最完整的原生文明,也是一种母体文明,它保存了许多能够维系人类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价值。当人类在资本的裹挟下面临混乱和无序的时候,这些“基因”需要被激活。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所运用的资源与工具部分来自东西文明交汇中由中华文明所传承和转化而来的精华性理念与方法,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对未来理想的描画中,唤醒了中华文明那些蛰伏的基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的武器”,激活了中华文明的理论思维;通过“武器的批判”,激活了中华文明的革命精神;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制度与文化基因。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母体文明;文化基因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5.0106

收稿日期:2024-10-1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内在渊源关系研究”(20&ZD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杨滢,女,湖南株洲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弗雷德福克斯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E-mail: miachenviolin@163.com;

林国标,男,湖南衡阳人,哲学博士,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其昭,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①。该讲话发表以来,学术界对“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作了反复阐释和论证,有的学者解释了什么是文化基因,并尝试建立中华文明的基因谱系^②;有的学者则探讨了“激活”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③;有的学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激活看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机理^④。这些研究无疑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理化阐释的表现。在肯定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不妨回到问题的原点,进行更朴素、更基础性的追问:中华文明为什么需要被激活?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被激活?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可以激活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激活中华文明的?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一 中华文明为什么需要被激活

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既具有悠久历史又保持着连续性的中华文明,任何单一化的考察视角都无法窥其全豹。从考古学视角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从连续性视角看,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历经五千多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从发展性视角看,中华文明又是一个能够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优长而不断返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求是》2023年第17期,第7页。

② 朱汉民《文化主体性与“第二个结合”》,《哲学动态》2023年第11期,第5-12页。

③ 郭建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北京日报》2021年12月13日,第13版。

④ 许忠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机理: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研究》,《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第6期,第29页。

本开新的文明。这是一种既有自身的本源根基又集聚各种文明优势的伟大文明。因此,这种文明无疑具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这也意味着中华文明具有某种能够因应环境变化不断自我革新,从而保持自身质态稳定的基因。

(一) 中华文明是一种基础性文明

古代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有面积最庞大、连成一体史前农业,尽管东西南北的条件有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同质的农业经济。在这片广大的农业区内曾经散布着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农业村落。它既是血缘的社会集体,也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为了维持再生产,这种血缘组织自形成之后就长期保留了下来,即使发生变化也没有彻底解体,成为数千年中国历史的社会基础。后来,原本自然分布的血缘村落整合成一个更大的社会实体,也就是文献所谓的“国”,国与国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从而产生了更大规模的也即国与国之间的整合。“于是在公元前 3000 多年前,诞生了良渚这样的大型地区国家,学术界或将这种大型地区称为方国、邦国”^①。实际上,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总结的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就点明了中华农业文明经过发展定型之后所具有的特征。如果我们跳出具体的文明形态的局限性,而从宏观的、总体的视角来看待它,与各种类型的文明相比,农业文明是一种基础性文明。这种“基础性”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它是人类最早的文明。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看,农业文明是产生时间最早的文明。第二,它是人类共同的文明。世界各个民族的发展尽管途径不一样,但必定首先经历的是农业文明。第三,其他文明都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其他文明包括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乃至数智文明都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次生或再次生文明。第四,农业文明是人类的直接文明。它是人类步入文明形态之后直接拥有的文明。

其他具有商业特点的文明则不同,它们都是次生文明而不是人类步入文明形态之后直接拥有的文明。如,“古希腊文明并非雅典人所创造的文明,而是集合了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文明成果,在环地中海劳动人民的共同供养下形成的次生文明”^②。就是说,作为西方文明之源头的古希腊文明,它不过是集合了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成果,而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都是农业文明。西方“文化”一词,本义为农耕和养殖,也就是说,人类定居下来,有了农业和畜牧业,就开始有了文化进而形成文明。这也意味着,农业是文化、文明之母。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起源于大河之畔,因为其适合农业生产。非洲大陆的尼罗河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埃及的农业文明。位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是人类继埃及以后的第二个文明中心,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后来商业比较发达,甚至成了西方商业文明的源头,但支撑起商业的还是发达的农业,因而,这里“城市的周围是发达的农业社会,城市之间贸易兴盛,政治、文化和艺术也有了高度的发展”^③。南亚次大陆早期的文明形态同样是农业文明,印度河流域肥沃且容易耕种的冲积土壤,再加上长而温暖的生长期和终年不断的日照,构成了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所以农业文明是一种基础性文明,或者说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之母。

(二) 中华文明是一种母体文明

中华农业文明所产生和形成的文化基因,有些可能是世界各类农业文明的共性。作为母体基因,它们或许会进一步零星地保留在后来的各种次生文明之中。也就是说,各种脱胎于农业文明的次生文明或许先天带有某些农业文明基因,这些基因或隐或显,随历史浪潮的涌动而沉浮。世界上各类型的文明都脱胎于农业文明,而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中华民族是把农业文明经营得最好、文明成果最辉煌的民族。因此,中华文明就是人类的“母体”文明。这种文明对人类文化性格甚至生物特征的塑造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对农业文明的开发和经营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从粮食产量来看,中国通过集约化农业生产^④,

① 王巍等《溯源中华文明》,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3 年版,第 129 页。

② 李晓鹏《巨变与突围:碰撞中的清帝国(1644—1840)》,天地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51 页。

③ 吴军《文明之光》(第 1 册),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1 页。

④ 集约型农业,是农业中一种经营方式,指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通过应用相对先进的农业技术来增加农业产量的农业。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数倍于欧洲的粗放型农业生产^①;从技术发明来看,直到明中叶前后,中国技术革新的速度和质量都超过欧洲,也大大超过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②;从文化教育来看,中国有着各式各样的官学和私学,培养出许多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成为传承文化、治理社会的中坚力量;汉字是中国各个区域、各群体之间交流、交往的统一的语言工具,从而保证了文化的统一。“中国拥有延续 2000 多年的科层制,以此来实现国家的相对有效的治理。……而在欧洲国家和印度等国,直到近代或现代才出现科层制”^③。

从总体上看,农业文明是一种基础性文明,也是一种包容性文明,它可以包容商业因素的发展。在传统的中华文明中,虽然总体上重农抑商,但这只是国家在特定时期平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策略,在实际生活中,商品经济一直在发展,而且相当繁荣,甚至比同时期的西方发展得还好。东周时期,“各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商业都会”^④。而商业文明无法包容农业文明,它本就是一种次生文明,以否定农业文明为标志。所以,商业文明的发展,在不断地对农业文明“去魅”,农业文明所孕育的集体主义、勤俭节约、劳动光荣、宏大叙事等传统的价值观和话语方式则遭到不同程度的否定或解构。相应地,资本主义所崇尚的巧取豪夺、丛林法则、个人至上、物质享受等价值观则受到追捧。习近平强调:“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⑤农耕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根,也是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和先进的文化的根基之一。中华农耕文明在文明起源时奠定了尊天爱人、天人合一、敬天法祖的宇宙观和道德观,没有发展出排他性的一神教信仰,在神权、王权与军权并存的格局中,最推崇世俗王权,发展成为广域王权国家。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华文明是“文化早熟、理性早启”,在上古时期就告别了宗教神权统治,形成了以道德代宗教的文化格局,并围绕世俗王权发展出成熟的礼制秩序,走向礼乐文明。在这种秩序之下,“只有文野之别,没有种族血统之本质分野,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人’”^⑥。

农业文明所产生的各种观念、制度、治理原则、生活方式,都充满着世俗性和人文性。这两者的结合,使其非常适合指导人类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静修”和“征服”都不是最好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中华文明的理性、中和的方式以其巨大的包容性使其充满了发展的韧性与活力。

(三)文明进步需要不断激活母体基因

作为典型的农业文明,中华文明较多地保存了适合人类持久生存和连续性发展的价值体系。人类不可能靠一种单一的文明统治天下,但不等于说不能有一种主导性文明引领人类世界。其中的常态格局就是一元主导、多元协同的格局。历史与环境的非单一性决定了在主导性的文明样态之下,还有多种次生性样态,次生性样态不存在彼此优劣的问题,只是它们都以母体文明为根基和背景,母体文明是它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如人类不管其生活方式如何变迁但总是需要吃喝拉撒一样,人类不管文明样态如何变化,但总是需要一些文化作为根基进行血脉维系以维持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性。

在资本主义文明凭着先进的武器建立殖民体系的时候,中华文明处于弱势地位。但作为一种母体文明,它可能被蹂躏,但不可能被灭绝。按照文明的演进规律,次生文明可能超越母体文明,但不可能完全覆盖并代替原生的母体文明。所以历史在等待一个契机,等待一个文明基因被激活、被唤醒的时间点。同时,中华文明又是能够被激活的,因为母体文明经过几千年的融合与改铸,包含了人类文化精华的优秀基因,具有最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经验与规则,具有永恒的价值。这些哺育了无数次生文明的优质养分或者说文化基因,只是蛰伏,没有死去,一场“及时雨”就足以让其重新生根发芽,长出茂密的森林。对中华文明来说,这里所说的“及时雨”就是马克思主义。

这就回到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问题:中华文明为什么需要被激活?因为作为发展得最好、最完整的原生文明,支撑其不断存续的优秀基因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可能被后来次生文明某些特征所覆盖,从而成为一种

① 陈绵水、冷树青《中华农业文明的早熟、融合发展与再生性》,《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74—78页。

② 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廷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56页。

③ 吴忠民《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2期,第26页。

④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⑤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60页。

⑥ 王凯歌《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历史评论》2023年第4期,第102页。

被遮蔽、被忽视的存在。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可能被遮蔽,但不会被灭绝,因为中华文明是一种母体文明,这种文明如果被灭绝,那就意味着人类本身的毁灭。在人类面临着无序和混乱的时候,或者中华文明本身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中华文明的基因需要被激活。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就是唤醒人类文明深处那些美好的元素——那些经过时间的洗涤,证明能够维系人类安全、理性、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元素。人类文明的发展,总需要一些元素来维系全球文明的稳定与平衡,这些元素就蛰伏于中华文明之中。

二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激活中华文明

要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马克思是如何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的。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文明本身是对农业文明的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文明的辩证否定。他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依据是什么呢?这里面是否有着与中华文明的某种隐秘的关联?

(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分析,由商品的二重性推出资本逻辑的二重性,由资本逻辑的二重性推出现代性的二律背反。现代社会一切分裂、对抗与矛盾,其实都不过是资本逻辑的写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心就是围绕着“资本逻辑”而展开的。他首先指出了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轴心作用。他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①在这个社会,资本是“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因为资本通过生产和再生产各环节塑造了社会分工、雇佣劳动、商品交换等现代社会的结构,并进一步以此为基础,塑造了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因此,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主宰,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小到具体物质形态,大到文化观念,无不深深打上资本的烙印。传统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形式,在资本的裹挟下,被抽去了丰富性和多样性,变成形式化和同一化的面具。

资本是个具有二重性质的矛盾体。一方面,它体现为具体的物,即商品和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它体现为特定社会关系,即人与人的社会交往活动。资本的二重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这个社会一方面孕育了先进的生产力,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形成了广泛的社会交往、复杂的社会关系,但另一方面,传统的人伦关系、美好的道德、人文情怀、崇高的价值,都被赤裸裸的利益追逐所取代。资本对利益的追逐导致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劳资的全面对抗、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资本全球扩张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

马克思对整个资本主义文明也展开了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运作方式是:以资本为轴心,资本创造利润,利润转化为财产,财产依托市场不断参与经济的循环,从而产生投资与资本增殖的行为。社会鼓励个人和经济实体追求利润最大化,通过投资和资本循环来增加财富。所以,私有财产、市场经济、雇佣劳动、资本积累、投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及国家机构等,构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基本框架,也决定了社会的主体结构。因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一切依附于其上所累层叠加的制度、精神、文化,都以资本为转移。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的标签,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标签。资本的一切本质和特征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说,“‘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②。

马克思揭示资本逻辑的秘密并非仅仅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是要真正说明,从时间上来看,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并不代表人类的永恒秩序;从空间上来看,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并不代表现代社会的全部,资本主义只不过“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③。

马克思使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与工具或者借鉴了什么理论资源对资本主义文明开展了批判?是什么样的理论分析使得马克思的批判是如此深刻有力,以致在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惊涛骇浪,使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否定成为一个时期的普遍性共识,并引发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西方一些著名学者如萨特、哈贝马斯、德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7页。

②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页。

③ 卡·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资本论》第三卷(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8页。

里达、皮凯蒂等对马克思的思想都给予了高度评价^①。习近平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②

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物质生产的分析，探究到了思想观念背后的物质动因，即“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③；马克思对物质动因的探讨，又捕捉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历史创造中的重大作用；通过研究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触摸到那些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和阶级行动起来的动力，以及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也就是通过对思想动机与物质动因、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历史瞬间与历史过程三者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马克思最终揭示了支配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 马克思批判所利用的工具与资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所利用的资源与工具主要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包括“社会物质生产”、“人民群众”、“唯物辩证法”、“共产主义”等理论与方法。

关于“社会物质生产”理论。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简言之，这种理论是从“唯物”的角度去分析社会历史现象，要求对事物性质和本质的把握，不必从精神维度或某种神秘的宗教维度去把握，而应从社会存在、物质生产、经济发展的维度去理解。相对于西方传统观念，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但我们如果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观语境，就会发现这正是中国人所熟悉的逻辑。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正是从这样的维度去理解人类社会。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强调人与土地、自然和物质的紧密联系，农耕社会中的人们深刻理解到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因而对物质和物质生产力具有深深的依赖。农业生产和作息规律，孕育了人们特有的时空观、秩序观和社会观。他们以自己生活的所在地为中心，延伸出“六合”的空间观念，进而建构出一套宇宙秩序观。在这种秩序观中，人们总是以坚实的大地为立足点，以物质性实体、物质性生产、物质性生活、物质性运动为其基本思维构架，确定物质的基础性或本体性地位。

关于“人民群众”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找到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在历史运动中，生产力是最重要、最革命的因素，而生产力在历史中的直接体现就是从事着物质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历史运动的真正动因是广大人民群众。西方传统的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一种唯心史观，它可能表现为主观唯心主义，也可能表现为客观唯心主义。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普通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各个流派的思想中，都保留着程度不等的民本意识，儒家的“民本”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等，都有着浓烈的民本关怀。在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划中，思想家们都把物质生产、社会稳定、财富增长以及保证这些因素良性运转的基础性要件——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等当作攸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情予以谋划。农民及他们的生产活动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是直接的，开明的政治家都不会忽视这种作用，而资本主义社会普通劳动人民的社会作用却被资本所掩盖。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策略，恰恰就抽丝剥茧地揭开了资本的神秘面纱，还原了劳动在社会中的真实地位。

关于辩证法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思想贯穿着丰富的社会实践逻辑，它来源于对社会历史运动复杂性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与西方来自古希腊传统的以形式逻辑为基本框架的辩证法具有本质的不同。形式逻辑的辩证法更多地来自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抽象。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而且这种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性，其原因在于它们都是来自对社会历史的深刻观察。

关于社会理想的问题。古代儒家有关于大同社会的构想，无数人都曾以之为依据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

① 晏扩明、庄雅清《浅析萨特人道主义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2024年第6期，第153—160页；陈永杰《脱离感性活动的交往主体——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体概念的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第1—10页；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任剑涛《落单的批判——从马克思〈资本论〉到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学术研究》2022年第6期，第52—62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③ 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2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58页。

度。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也同样是激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和号角。其中,“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的内在契合性,学术界已有一些探讨和说明^①。习近平也强调:“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②

(三)工具与资源的运用唤醒了中华文明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贯穿其中的思想方法都来自古代农业文明中对农业生产规律、物候变化、天象运转、粮食丰歉、人事变动、王朝兴替等现象的综合反映,也是农业文明的思想表达。农业社会当然要注重物质生产,而且特别注重直接性的物质生产,“重农抑商”是农业社会一种重要的发展策略。重视农业生产就意味着对直接从事生产中的人要给予利益上的关照,所以,“民”往往是许多重要思想家建构理论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所运用的工具和资源,很多当然是他本人的理论原创,如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他的两大理论发现,但任何一种原创性理论都有它所愿意借鉴的精神资源。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无疑与同样是资本主义精神对立面的古典农业文明的思想遗产有自然的亲近感。马克思批判理论对物质生产的重视、唯物主义的思考倾向、对劳动者的社会历史作用的强调,与中国古代儒家相关理念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马克思对资本拜物教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所参照的政治与道德标准是优秀传统美德、田园牧歌式的乡村风情、权力相对集中且拒斥资本逻辑的管理模式、尊礼重义与守望相助的基层社会秩序等。特别是对理想社会的设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儒家的“天下为公”不仅在理论界为人津津乐道,而且在中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彼此融合成一种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理想。由此可见,农业文明的一些思想和理念精华,被一个伟大的灵魂所触及,并升华成一种锐利的思想武器。

所以,马克思的思想与农业文明的理论表达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契合性,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以思想的形式表达了对农业文明的礼敬。这就可以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激活中华文明,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本身就“同频共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语境下复兴了传统农业文明的某些思想精华,其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所借用的工具和思想资源,部分就是农业文明所传承与改造而来的精华性理念和方法。在这种批判的过程和对未来理想的描绘中,唤醒了农业文明那些蛰伏的基因,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其可以激活中华文明。

三 马克思主义如何激活了中华文明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的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③他还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④

从习近平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明白两个方面的道理:一是中华文明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被激活的;二是这种激活是全方位的,全方位激活的方式是“互动”,这种互动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结合与双向互动,在自身被丰富和发展的同时使中华文明在理论、道路、制度、文化诸方面得以全方位地激活,从而使中华文明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激活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历史过程。因此,“激活”始终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它是一种进行时,是一种历史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的武器”,激活了中华文明的理论思维

^①张允熠《解读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7期,第11—18页;张允熠《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来源”之中国元素》,《理论建设》2016年第1期,第5—11页;张允熠、张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背景的研究》,《学术界》2007年第6期,第24—35页。

^②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求是》2023年第17期,第7页。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④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求是》2021年第7期,第5页。

前面已经述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在这种批判的过程中,有了马克思的两大理论发现,即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也就是锻造出了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武器”。虽然它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它毕竟是剖开资本主义腐烂肌体的一把手术刀。因为有了马克思建立的“批判的武器”,才使资本主义的一切反动的、专制的、剥削的本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正是这种批判,激活了中华文明一些古老的理念与方法。

资本改变了历史,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甚至可以说是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文明。在马克思笔下,这种文明有如下的特征:利己主义、自私自利、急剧的不稳定以及资本逻辑。所以,人间生活的各领域,从城乡格局、文明形态、世界历史乃至个人见解与情感,都被其不断改变。很显然,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文明,因为斩断了与过去的一切联系,不注重文明之间的联系与过渡,所以与农业文明实际上处于对立状况。也就是说,农业文明的一切方面,从观念、制度、文化到道德,在资本主义文明中都遭到了彻底的否定。马克思则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再否定,这种否定,首先是通过理论批判的途径,即通过批判的武器,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否定。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看家武器,当然是辩证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辩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通过物与物关系的审视揭示其背后蕴藏的商品拜物教本质,即始终从多样存在方式和社会关系出发考察历史,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正、负面历史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他既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①,也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利己主义、自私自利、急剧的不稳定以及资本逻辑等特征。这种辩证的否定观意味着否定中包含着肯定,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因为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古典辩证法的契合性,所以唯物辩证法在其中国化过程中很容易唤起中国人对古典辩证法的记忆,并自觉地进行转化创新。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往往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的概念、理念来对辩证法进行二次解释。如毛泽东在对矛盾范畴、认识的辩证过程、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阐述中,就对唯物辩证法和中国古典辩证法进行了很好的融合。

除了辩证法理论武器,马克思还运用了其他思想工具如“感性活动”原则、“现实性”原则、“历史过程”原则等对资本主义开展批判。

所谓“感性活动”原则,是马克思实现哲学观变革的表征。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现实基础和社会关系基础。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基础不是“意识”、“绝对精神”等观念性的东西,而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物质生产”、“经济基础”等感性的、物质性的东西,所以,不能仅仅从意识、精神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而要从感性的、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解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一个精巧复杂的文明社会结构,归根结底,建基于其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构成的物质性基础。

所谓“现实性”原则,是指马克思运用“现实的主体”、“对象性活动”等概念工具来对抗黑格尔所宣扬的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资本就是借助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魅惑力量来实现对人的精神统治,让人在思想的王国中进行自我循环,而不去在实践中解决社会问题。资本逻辑所榨取的剩余价值隐藏在抽象劳动之中,这正是资本剥削工人劳动的惯用手法。

所谓“历史过程”原则,是指现代社会体现为现实的主体即实践活动中的人所展开的现实生活过程,这种过程性体现为阶段性、具体性、历史性和相对性。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工业状况中产生的,因而对它的理解,必须与特定历史阶段的工业生产与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马克思破除了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种永恒的、超历史的、普遍性的文明形态的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规律、趋势、适用范围和最终走向。

从以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采取的分析工具和观念原则来看,虽然他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哲学的辩证法和整体性观念,但总体上与西方传统的哲学世界观、历史观大相径庭。他所运用的思维工具和所导入的基础性观念,对于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来说,则是一种明显的反叛。那么,这种反叛性思想从何而来?当

^①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然不能否认马克思基于自身的原因而产生的创造,但部分是启蒙运动以来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下吸收世界性文化包括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结果。启蒙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受到追捧和传扬,从而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一部分。马克思所借用和传扬的,正是这股来自东方的文脉,而这种来自东方的文脉,带着东方农业文明的注重整体、系统、联系、过程、历史等古老而灵动的气息,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一些学者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都不约而同地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纷纷以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前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理解、再解读。正是这些内在的关联,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理论思维的能力。

(二)马克思主义通过“武器的批判”,激活了中华文明的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也验证了这种理论的适用性和改变世界的的能力,同时也激活了中华文明的革命性基因。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作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筹备经过和招生情形报告和他亲自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3门课程中,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提出要反对封建专制文化,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身上存在的劣根性进行分析,但并不否定这个群体的社会历史作用。恰恰相反,毛泽东看到了他们的历史作用,希望把他们塑造成一股有生力量,以适应革命运动的需要。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农民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农民不仅仅是文化创造和社会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社会实践更是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丰厚土壤。如果说,在旧时代哪一个群体能体现和代表中国的传统,那当然是农民。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地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毛泽东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的中国具体实际,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要产生实效,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①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②。其所强调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要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能割断历史,通过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和吸收民族性的精华而发展民族新文化。只有继承历史,弘扬历史,我们才能创造未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利用传统文化来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动员全民抗战需要大众化的民族化的文化,需要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左翼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抗日救亡的新启蒙运动。他们力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能够凝聚民族力量的思想文化资源,从而唤起民众的爱国精神。他们认为,深入推进文化的大众化运动还需要汲取传统文化中有用的精粹,这样才能建立起整个中国自己的新文化。毛泽东相继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性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辩证法很好地结合起来,建立了用中国文化、中国经验来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规范。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动员、思想工作、阶级斗争等方面的工作中都借用了传统文化的资源。为组织最广大的民众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洪流中来,中国共产党作了最广泛的政治动员。他们继承了传统的“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侠义思想和公平正义思想,并把它们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相结合,唤起了千百万最底层民众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自觉,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和土地革命高潮。毛泽东继承了儒家“家国一体”的共同体本位思想和“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传统认知,提出了“战争的伟力最深厚之根

^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709页。

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兵民是胜利之本”^②的著名论断,将“原子化”的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筑成抵抗日本侵略的钢铁长城。

(三)马克思主义通过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制度与文化基因

制度是用来调节社会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制度的形成,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与具体实际互动发展的结果。当历史传统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毫无疑问,这种历史传统就会被激活。中国政治制度同样不是“飞来峰”,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围绕中国的具体实际进行创造性建构的产物,同时又是中国立足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继承和发展传统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思想的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政治制度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传统制度文明的优秀理念如“多元一体”、“天下为公”、“民为贵”、“和而不同”已成为全球软实力包括制度治理能力竞争中保持制度韧性的不竭的精神源泉。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行更加强调整民主和集中、多元和一体、表达和共识等的有机协调,囊括了国家统一、法治统一、市场统一的方方面面,这无疑也会激发我们向中国治理传统去取经,因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与“大一统”思想紧密相关,其本质是多元性和一致性的辩证协调。“多元中的统一”与“统一中的多元”,这对矛盾主导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也塑造了中国式文化观念与制度架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民族众多、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复杂治理局面时,围绕各民族、各阶层、各界别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建立起系统完备的政治制度体系。从制度运转效果来看,已形成强大的制度凝聚力和整合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整合力,与其对传统制度文明从理念到方法的借鉴和辩证吸收分不开。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依托的是具有五千年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华文明,依靠的主体是吮吸着中华文化乳汁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一些传统制度文明的精华也自觉地参与制度的建构,经过一轮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了引人瞩目的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

从制度治理的维度来看党的作风建设,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到传统的“民本”思想,从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廉洁标准的确定到传统理想人格的培育,从党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到传统的修身、内省实践,分明有一条往传统回溯的传承路径。“民本”、“爱人”、“爱众”(孔子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语)，“正身”、“修己”(孔子语)，“反己”、“责善”(王阳明语),作为制度理念和制度精神,这些范畴普遍存在于党的建设的话语之中。刘少奇就曾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看成是“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等解释为共产党人的操守和气节,把“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方法宣扬为共产党人加强自我修养的最佳途径。在这种古与今的对接与互动中,中华文化逐渐从资本主义话语制造的尘埃中被唤醒,成为构建文明新秩序的重要资源与力量。

现代化从来不能孤立地进行,总是和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互动地进行。习近平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③。“历史渊源”、“文化根基”就是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底蕴。从当今回溯过去,它是根基;从过去指向当今,它就是被激活的优秀基因,渗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时空之中。

[责任编辑:何毅]

①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

②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9页。

③习近平《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27页。